

社区教育生态优化的困境剖析与化解路径

冯攀静

(江苏开放大学 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6)

摘要:教育生态理论强调教育系统内要素的共生关系与协同效应,以及通过自适应调节机制实现教育生态的稳态维持与可持续发展。当前社区教育生态面临内生性矛盾、外源性约束、空间非均衡、参与者角色异化等多重挑战。为破解这些难题,提出从政策重构、认知培育与资源整合三个维度综合施策:在政策层面,强化顶层设计,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体系,打破现有治理格局中的壁垒;在认知层面,培育居民的生态认知与社区认同,激发其参与社区教育的内生动力;在资源层面,依托数字平台搭建资源共享机制,推动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与高效利用。通过有效施策,可以激活多元主体参与动力,弥合资源分配的结构鸿沟,进而促进教育生态系统的韧性提升与可持续发展,为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社区教育;生态优化;困境解构;协同治理;化解路径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25)10-0076-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的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教育现代化擘画了清晰的实践路径。作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的枢纽性构成,社区教育既承载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基层实践使命,也构成实现 2035 中国教育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关键实践场域。在政策规约与实践需求的双重驱动下,社区教育被赋予消弭教育数字鸿沟、赋能终身学习体系、助推学习型社会建构三重历史使命。现有研究聚焦于社区教育的功能定位与组织形式,对教育生态理论框架下系统性优化的学理探讨与实践探索不足。这种研究缺位集中体现为:在理论建构维度,社区教育生态系统内部要素的互动机制与动态平衡机制缺乏学理解构,教育生态理论与社区教育实践的耦合路径尚未得到学理澄清;在实践创新维度,社区教育生态优化的制度设计、资源配置与主体协同机制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具体表现为政策执行效能衰减、资源整合机制梗阻、多元主体权责边界模糊等现实困境。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割裂既制约了社区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功能释放,也消解其推动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价值。

有鉴于此,以教育生态理论为分析框架,着重回应三个核心命题:教育生态理论如何为社区教育实践提供系统性分析工具?社区教育生态优化的深层

矛盾与制度性障碍如何形成演进?如何通过跨域协同治理与机制创新实现教育生态链的良性循环?通过破解上述命题,致力于构建社区教育生态优化的解释性模型与操作性范式,为消解“数字赋能”与“生态失衡”的内在张力提供理论支撑,最终指向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达成。

一、教育生态理论范式解析及其方法论适配性

(一)教育生态理论的知识谱系与核心特质

教育生态理论作为跨学科研究的理论范式,其发展脉络呈现出显著的国际化特征与阶段性演进规律。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 20 世纪初教育社会学与生态学的学科交叉:1932 年,美国教育社会学家沃勒(Waller)在《教学社会学》中首次提出“课堂生态学”概念,标志着生态学范式正式进入教育研究领域^[2]。1976 年,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克雷明(Cremin)在《公共教育》中首次提出“教育生态学”专业术语,将其定义为“研究教育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3],由此奠定该理论的学科基础。此后,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在 1979 年出版的《人类发展生态学》中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4],进一步拓展了教育生态理论的解释维度,推动其向多层次、动态化的纵深发展。相较于国际研究进程,国内教育生态理论发展呈现出独特的本土

收稿日期:2025-05-1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社会教育(社科普及)专项课题“生成式 AI 驱动的社区教育工作者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编号:24SJA-25)。

作者简介:冯攀静,江苏开放大学教育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管理、社区教育、教师发展。

化路径。1988年,吴鼎福在《教育生态学刍议》中首次译介该理论^[5],并于1990年与诸文蔚合作出版首部同名专著,创造性地构建了以“生态位”“生态链”为核心的概念工具箱。2006年,吴林富的《教育生态管理》出版^[6],标志着国内研究从理论阐释向实践应用的重要转向。

历经概念建构、理论探索、实践应用的三阶段,教育生态理论已形成两个核心理论维度:其一,系统关联性,强调教育系统内政策、资源、主体、环境等要素的共生关系与协同效应;其二,动态平衡性,主张通过自适应调节机制实现教育生态的稳态维持与可持续发展。该理论实质是生态系统理论在教育场域的方法论迁移,通过解构教育内外部环境的能量流动与信息交换,为教育现象研究提供了整体性、动态化的分析框架。

(二) 教育生态理论与社区教育实践的范式耦合

社区教育生态优化作为推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关键路径,其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建构需要教育生态理论的方法论支撑。尽管现有研究在社区教育的功能定位、组织形态、资源整合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在教育生态理论框架下对社区教育系统性优化的学理探讨仍显不足,尤其缺乏对生态困境生成机制与治理路径的深度解析。通过理论嵌入发现,二者存在四重耦合逻辑:

其一,系统关联性与实践整合性的范式共振。教育生态理论强调的系统整体性与要素联动性,与社区教育实践的资源整合需求形成理论映射。克雷明提出的“教育生态互动模型”可为社区教育提供方法论指导,通过重构多元主体角色定位与资源联动机制,破解教育实践的碎片化困境。这种耦合关系本质上体现了系统论思维在教育治理中的实践转化。

其二,动态适应性与需求导向性的机制契合。教育生态理论的学习者中心取向与社区教育的多样化学习诉求响应特征形成逻辑闭环。二者共同强调教育过程对环境变迁与个体差异的动态适应,要求构建“需求-供给”双向匹配机制。这种耦合机制为社区教育课程设计的弹性化改造与服务供给的精准化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三,环境依赖性与资源协同性的结构对应。教育生态理论将环境视为关键变量,与社区教育实践的资源整合需求形成结构对应。通过激活社区内外环境资源(文化设施、社会组织、数字平台等),构

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网络,可实现教育生态的资源优化配置。这种耦合关系凸显了社区教育在空间治理与资源再配置中的独特价值。

其四,教育公平指向与共享机制的价值耦合。教育生态理论的教育公平诉求与社区教育的资源共享实践形成价值共鸣。通过建立数字化学习社区、跨区域师资库等共享平台,可消弭教育获取的阶层差异,实现教育生态的帕累托改进。这种耦合关系既体现了教育公平的实践要求,也印证了生态理论的价值理性。

上述耦合关系表明,教育生态理论可为社区教育实践提供“系统分析-动态调适-环境优化-公平实现”的全链条方法论工具。这种理论-实践的双向赋能,不仅有助于推动终身学习型社区从理念建构向生态治理转型,而且为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社区教育制度创新提供了学理支撑。通过生态理论的实践转化,可望实现社区教育生态的稳态维持与可持续发展,最终完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促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社区教育生态优化的困境解构

(一) 内生性矛盾:生态系统要素的结构性失衡

社区教育的内生性矛盾源于生态系统内部要素的失序与制度设计的路径依赖,形成多维度的结构性冲突。依据教育生态理论的“系统关联性”原则,可将其解构为以下核心矛盾群:

1. 目标系统的价值排序困境

社区教育承载着个体发展需求与社区公共利益的双重价值诉求,形成“个性化服务-普惠性供给”的悖论性张力。这种矛盾在实践场域具体表现为:其一,弱势群体的特殊教育需求因资源分配机制缺陷而遭遇系统性忽视;其二,社区公共目标的泛化表述导致政策执行中的价值失焦。这种价值排序困境本质上反映了教育生态理论中“生态位重叠”现象——不同发展目标在有限资源约束下产生的生存竞争,最终演变为教育公平的实践危机。

2. 内容供给的适应性断裂

社区教育课程设计长期受“统一性”范式主导,面临标准化供给与个性化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典型表征为:老年群体的“文化养老”需求与青年群体的“职业赋能”诉求存在显著代际差异,但教学内容仍沿用行政化配置模式。这种矛盾实质是教育生态“动态平衡”机制失效的产物,反映出教学内容更新

滞后于学习者需求变迁的制度性梗阻,最终导致教育服务的供需错配。

3. 治理权责的纵向配置失衡

社区教育管理中存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与“自下而上”的自主治理张力。整体治理呈现“条块分割”的行政化特征,形成“政策悬浮”与“基层失语”的双重困境。具体而言:其一,中央政策设计因缺乏地方性知识支撑而难以有效落地;其二,基层社区在课程开发、师资聘用等核心环节缺乏自主决策权。这种垂直治理结构抑制了多元主体的协同效应,与教育生态理论强调的“扁平化治理”理念形成尖锐冲突,加剧了生态系统的功能耗散。

4. 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异化

社区教育涉及政府、教育机构、企业、居民等多方利益相关者,但其角色定位与权责边界尚未明晰。多元主体在政策执行中呈现“利益分化”特征:其一,企业参与社区教育多聚焦短期效益,容易忽视社会责任的长期性;其二,居民因“搭便车”心理导致参与动力不足。这种异化行为削弱了教育生态系统的共生能量,加剧了资源整合的制度性困境,形成教育生态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削弱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效能。

(二) 外源性约束:环境场域的制度性梗阻

社区教育政策的制度性缺陷,本质上是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政策设计的碎片化、资金供给的单一性以及评估机制的形式化,其根源可追溯至制度供给滞后与治理能力不足的叠加效应。基于教育生态理论的“动态平衡性”原则,可从以下维度解构其困境:

1. 政策体系的碎片化与顶层设计缺位

尽管我国社区教育政策历经阶段性演进,但其制度框架仍呈现“分散化”特征,如2004年《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7],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8],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9]。这种碎片化具有双重表现:其一,中央与地方政策缺乏纵向协同,基层政策创新受限于上位法支撑不足;其二,跨部门政策(如教育、民政、文化)横向联动机制缺失,导致“多头管理”与“责任推诿”并存。政策缝隙直接制约了社区教育生态的完整性。

2. 资金供给的单一性与社会参与乏力

当前社区教育经费高度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社

会资本介入比例明显不足,暴露出“政府主导-市场缺位-社会旁观”的非均衡格局。这种单一化资金结构不仅加剧财政压力,而且抑制了社区教育的创新活力。例如,企业捐赠多集中于硬件设施建设,对课程开发、师资培训等软性投入显著不足;而社会组织因政策激励不足,难以形成可持续参与模式。资金链的脆弱性直接制约社区教育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生态的转型。

3. 评估机制的形式化与效能衰减

社区教育评估长期存在“指标泛化”“方法粗放”“反馈迟滞”等问题。现行评估体系过度侧重量化指标(如培训人次、场地面积),忽视质性维度(如居民参与度、社区凝聚力提升),导致政策执行陷入“数字达标”的功利化陷阱。此外,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度低、监管机制不健全,使评估结果难以真实反映教育成效,评估失效使教育生态的“负反馈调节”机制失灵。

4. 法律保障的滞后性与权责模糊

相较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社区教育缺乏专项立法支撑,现有政策多属“指导性文件”,法律效力和约束力薄弱。这种制度软约束导致多元主体权责边界不清,例如,企业在社区教育中的社会责任缺乏法定依据,居民参与权益保障机制尚未建立。上位法律缺位使社区教育生态优化陷入“有政策无执行”“有目标无问责”的治理困境。

(三) 空间非均衡:资源配置的生态位势差

社区教育资源的配置失衡本质上是教育公平原则与区域发展差异相互作用的产物,其表现为地域、城乡及群体间的系统性排斥,严重制约社区教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教育生态理论的“资源协同性”原则,可从以下维度解构其多维困境:

1. 地域分异与资源集聚的马太效应

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导致教育资源呈现“中心-边缘”分布格局。经济发达地区凭借财政优势与政策倾斜,形成优质教育资源(如数字化设施、专业师资)的虹吸效应。长三角地区的社区教育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远高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由于大量的专项经费用于硬件建设,软性资源(如课程研发、教师培训)投入严重不足。这种“富者愈富”的资源分配逻辑,加剧了区域间教育生态的层级分化,形成教育“空间剥夺”现象。

2. 城乡二元结构与制度性排斥

城乡社区教育资源差距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

(如场地、设备) ,而且反映在制度设计与文化资本积累上。一般来说,经济较发达地区由于教育资源投入大、社会关注度高,通常会使得优质资源集聚,社区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社区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和师资力量都较为雄厚;偏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对社区教育持有排斥态度,以至于对社区教育的目标和内容都缺乏基本的认识^[10],获得的社区教育资源则相对匮乏,甚至可能连基本的教育设施设备都无法得以保证,陷入“资源洼地”困境。这种制度性排斥使农村社区沦为教育生态系统的“边缘飞地”,加剧了教育公平的“空间正义”危机。

3. 群体分化与弱势阶层的权利剥夺

教育资源分配中存在显著的群体性排斥机制。弱势群体(如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因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双重匮乏,面临“物理可及性”与“文化适应性”的双重壁垒。例如,一些弱势群体,如贫困家庭、残疾人等,可能由于经济、身体条件等原因,无法享受到与其他人均等优质的社区教育资源。这种排斥性分配模式,实质上是教育权利的制度性剥夺,与教育生态理论倡导的“普惠性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4. 政策工具失灵与资源流动性阻滞

现有资源配置政策过度依赖行政指令,缺乏市场机制与社会力量的协同驱动。例如,政府购买服务多集中于传统教育项目,对社区特色课程(如非遗传承、乡土文化)支持不足;而社会组织的资源供给受限于准入壁垒与激励缺失,难以形成可持续参与模式。这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叠加效应,导致资源流动陷入低效闭锁状态,加剧了教育生态的“资源诅咒”现象。

(四) 参与者角色异化:多元主体的协同困境

社区教育参与者角色的过度分化本质上是多元主体治理能力不足与制度设计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表现为角色定位模糊、行动逻辑冲突、资源整合低效,严重制约教育生态系统的协同效能。基于教育生态理论的“多元共生”原则,可从以下维度解构其深层矛盾:

1. 角色固化与功能锁定

当前社区教育参与者被简化为“资源提供者-接受者”“管理者-被管理者”等二元对立角色,形成刚性化的分工结构。例如,政府常扮演资源分配与政策制定者,而社区居民多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民间组织则因权能受限沦为“项目执行工具”。这种角色固化抑制了主体功能的弹性转换,导致教育服务

供给与居民需求的动态适配性不足,形成教育治理的角色僵化困境。

2. 利益博弈与协同动力匮乏

多元主体因目标取向差异产生利益冲突:政府追求政策绩效最大化,企业注重经济效益回报,居民则关注个体学习效用。各参与者之间因为利益和需求的差异产生沟通隔阂和合作障碍。这种利益导向的错位,削弱了主体间协同合作的可持续性,导致教育服务的割裂,无法满足社区居民全面和多样化的需求。

3. 权力失衡与资源垄断

强势主体(如政府、大型企业)凭借资源掌控权形成“中心-边缘”权力格局。大量的社区教育项目由政府部门主导设计,而居民提案采纳率不足。某些参与者过度掌控资源,从而导致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协调,甚至导致资源不平等分配。资源分配权的高度集中,不仅加剧了弱势主体的边缘化,而且导致教育资源流向与社区实际需求的结构性偏离,形成教育治理的“权力异化”现象。

4. 沟通壁垒与信任缺失

参与者间缺乏制度化协商平台与信息共享机制,致使行动逻辑难以协调。教育机构提供的标准化课程与社区居民个性化需求之间存在显著鸿沟,但因反馈渠道不畅,课程优化滞后。这种沟通失效进一步侵蚀主体间信任,形成“低效合作-资源耗散”的恶性循环,加剧了教育生态系统的“协同赤字”。

三、社区教育生态优化的治理路径探索

(一) 政策重构:构建生态化治理的制度支撑体系

社区教育生态优化需以教育生态理论的“多元共生”原则为方法论基础,通过制度重构破解“政府独大-市场缺位-社会失语”的非均衡治理困局,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居民赋权”的生态治理范式。具体路径如下:

1. 立法保障与政策协同的双重突破

基于教育生态理论的“系统关联性”原则,需构建“法律规范-政策配套-标准指引”的三维制度框架:其一,借鉴他国《社会教育法》立法经验,出台《社区教育促进法》,明确社区教育的法律地位、多元主体权责边界及财政保障机制;其二,建立中央与地方政策的纵向协同机制,通过“政策试验区”模式赋予基层创新空间;其三,推动教育、民政、人社等部

门的横向政策整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与跨部门绩效联评机制,破解“多头管理”痼疾,形成政策合力。

2. 四维协同治理体系的机制创新

构建“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的闭环治理链条:决策层成立社区教育战略委员会,吸纳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代表形成“多元共治”架构;执行层推行“项目制+公益创投”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激活社会组织参与;监督层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建立“过程透明度-结果有效性-社会影响力”三维评价体系;反馈层搭建数字化民意直通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需求动态捕捉与政策迭代优化。

3. 资源流通与共享的数字化赋能

针对资源错配等难题,依托数字技术构建“资源池-需求池”的智能匹配系统:其一,建立教育资源数字身份证体系,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课程、师资、场地等资源的权属认证与跨区域流通;其二,开发“需求画像-资源图谱”智能匹配算法,依据学习者特征(如年龄、职业、兴趣)与社区发展需求(如产业转型、文化传承)进行精准推送;其三,实施“基本保障+梯度激励”的资源分配规则,对农村及弱势群体配置专项资源包,并通过“教育券”“学习积分”等工具增强供给弹性,从而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促进社会整体的均衡发展。

4. 多元筹资与风险共担的金融创新

突破财政依赖路径,构建“财政保基本-市场增活力-社会补短板”的混合筹资体系。这样的体系旨在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具体措施包括:其一,设立国家级社区教育发展基金,采用“政府配资+社会众筹”模式,吸引企业资金与公益基金会参与,从而为社区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其二,试点“教育债券”“社会影响力债券”等金融工具,将社区教育项目纳入绿色金融支持范畴,为教育投资者提供合理的回报,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目标;其三,建立捐赠配比激励机制,对参与社区教育的企业给予税收抵扣与政府采购倾斜,以此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

(二) 认知培育:生态价值观的社区内化融合路径

社区教育生态优化的深层动力源于生态价值观的社区内化,需构建“认知培育-价值认同-行为转化”的完整链条。基于教育生态理论的“系统关联性”与“动态适应性”原则,具体路径如下:

1. 生态认知的沉浸式培育

构建“理论渗透-实践体验-价值内化”的三阶培育体系:其一,开发“生态素养通识课程”,运用沉浸式工作坊虚拟现实(VR)技术模拟生态系统运行,使居民直观理解教育生态的共生逻辑;其二,建立社区生态教育实践基地,通过垃圾分类监测站、雨水收集系统等可参与设施,实现生态认知从“抽象概念”向“具身经验”即时转化;其三,定期发布《社区生态教育白皮书》,举办社区生态教育成果展,以数据可视化方式呈现居民参与对生态指标(如碳减排量、生物多样性)的改善成效及叙事化案例(如居民参与生态项目的故事),分享,强化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

2. 角色赋能与主体性激活

突破“学习者”单一角色定位,构建“教育者-实践者-传播者”的三维角色转换机制:其一,设立“社区生态导师”制度,选拔骨干居民参与课程设计与活动组织,形成“能人带动-群体跟进”的扩散效应;其二,创建居民自治型“生态学习合作社”,通过项目制运作(如社区花园共建、节能改造众筹)培育居民自组织生态学习社群,通过同伴互学与经验共享提升其生态素养与行动能力;其三,开发“生态教育志愿者积分系统”,将参与时长转化为社区服务兑换权益,激活社区内生的社会资本,形成“认知-能力-行动”的正向循环。

3. 动态反馈与生态智慧生成

建立“需求识别-过程追踪-效果评估”的全周期智能反馈机制。其一,部署社区教育物联网终端,通过数字化民意采集平台(如社区教育APP、微信小程序等)课程访问频次、在线互动时长)实时监测居民对生态教育的认知变化与诉求演进,构建动态需求图谱,并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识别不同群体的认知盲区与参与障碍;其二,开发“教育生态健康指数”,从资源流动性、主体协同度、系统韧性等维度量化治理成效,为政策调优提供科学依据。这种反馈机制不仅可优化教育供给策略,而且能强化居民在教育生态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4. 跨界协同与教育共同体构建

打破社区教育“孤岛化”场域困境,形成“校社联动-产教融合-城际协同”的开放生态。其一,通过课程衔接(如将社区生态实践纳入学校综合实践活动学分)、资源共享(如开放学校实验室支持社区环保项目)、角色互嵌(如教师兼任社区生态顾问)等方式,促进教育要素的跨域流动;其二,联合环保

组织、科研机构开发“绿色技能培训包”,共同开发“社区生态观测站”“低碳生活实验室”等创新载体,将社区教育转化为产业人才储备池;其三,发起“城市教育生态联盟”,通过跨区域师资轮岗、课程资源共享实现生态互补,将生态文明教育转化为可触达、可参与的社区公共生活实践。

(三) 资源整合: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生态化配置

社区教育资源作为教育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其配置效能直接影响社区教育的公平性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教育生态理论的“资源协同性”原则,需构建“需求驱动-技术赋能-制度保障”的三维配置框架,推动社区教育资源从“分散割裂”向“系统耦合”的范式转型,具体路径如下:

1.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资源配置机制

突破传统“政府供给-市场缺位”的线性模式,构建“政社企居”四维协同的资源配置网络:其一,开发社区教育“资源智能中枢”平台,集成区块链认证、智能匹配、需求预测等功能模块,实现教育资源全生命周期管理;其二,设立“教育公益创投基金”,通过税收杠杆撬动企业参与课程开发,形成“社会投资-教育产出-社区受益”的价值循环;其三,建立社区教育资源孵化中心,培育居民自组织学习社群,形成“需求生成-资源对接-效果反馈”的闭环机制。

2. 推进数字化驱动的资源流动网络

针对社区教育资源流动性阻滞难题,实施“双轮驱动”的技术解决方案,需以数字技术为杠杆,构建“资源池-需求池”智能匹配系统。在供给侧,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教育资源(如师资、课程)的权属确权与跨区域共享,打破行政壁垒导致的“资源孤岛”效应;在需求侧,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建立动态资源分配模型,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学习行为轨迹、社区发展指标、人口结构预测),精准识别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缺口,并优先向其倾斜优质资源,实施差异化资源投放策略。

3. 完善资源效能评估与动态更新体系

现行资源管理普遍存在“重投入轻效益”的功利化倾向,需构建“过程透明-结果有效-影响深远”的资源评估框架。其一,开发量化与质性融合的评估指标体系,除传统的硬件配置率、课程覆盖率以外,增设居民参与度、社区凝聚力提升度等生态化指标;其二,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资源分配中的隐性排斥机制,通过德尔

菲法确立弱势群体资源获取的基准阈值;其三,建立“熔断式”资源更新机制,对使用率低于阈值的课程或设施进行迭代优化,同时将居民满意度反馈纳入资源再配置决策链。此举可确保教育资源供给始终与社区生态需求保持动态适配。

4. 强化制度保障与生态补偿政策

破解资源分配的制度性壁垒,需要构建“基础保障-差异补偿-市场激励”的政策工具箱。其一,推动《社区教育促进法》立法进程,明确规定企业、社会组织参与资源供给的法定义务与社会责任投资抵扣机制;其二,设立“教育生态补偿专项基金”,对人均教育资源低于全国的地区实施多元主体资源注入,对资源匮乏地区实施定向财政转移支付;其三,创新“教育资源证券化”金融工具,允许社会组织以未来教育收益权为质押发行债券,构建“投入-增值-反哺”的可持续循环。

四、结论与展望

社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神经末梢与生态化实践场域,其优化过程本质上是教育生态系统内外要素协同演化的自适应调适。社区教育生态优化面临着生态系统要素的结构性失衡、环境场域的制度性梗阻、资源配置的生态位势差、多元主体的协同等方面困境。例如,政策体系的碎片化、资金供给的单一性、评估机制的形式化和法律保障的滞后性等制度性问题,严重制约了社区教育生态的良性发展。

研究证实,教育生态理论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方法论工具。基于教育生态理论,从政策重构、认知培育与资源整合三个维度,系统剖析了社区教育生态优化的困境及化解路径。具体而言,在政策层面,强调构建生态化治理的制度支撑体系,包括立法保障与政策协同的双重突破以及四维协同治理体系的机制创新;在认知层面,聚焦于生态价值观的社区内化融合,通过沉浸式培育、角色赋能、动态反馈和跨界协同等路径,提升居民的生态认知与社区认同;在资源层面,着重构建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生态化配置,提出多元主体协同的资源配置机制、数字化驱动的资源流动网络、资源效能评估与动态更新体系、制度保障与生态补偿政策等具体措施。通过政策重构打破现有治理格局中的壁垒,通过认知培育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内生动力,通过资源整合推动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与高效利用,助推社区教育从“工具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范式跃迁,提升社区教

育生态的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面向“十四五”时期教育现代化目标,社区教育生态优化需聚焦三大前沿趋势:其一,治理现代化转向,探索“政策规制-市场驱动-社会自组织”的三元共治模式,通过教育立法与金融工具创新,破解资源依赖的路径锁定;其二,技术深度融合,依托多模态数据融合与联邦学习技术构建智慧教育生态,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全生命周期动态评估;其三,教育共同体建构,推动“学校-家庭-社区-企业”的跨界资源互嵌,将生态教育转化为可量化、可感知的社区公共产品。需特别警示的是,在数字技术赋能过程中,必须构建“技术伦理-教育公平-人文关怀”三重防护机制,避免算法歧视加剧教育不平等,防止技术理性异化教育本质,这将成为后续研究的重点议题。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1).

[2]WALLER W.The sociology of teaching[M].Hoboken:

John Wiley & Sons,Inc.,1932.

[3]LAWRENCE A. CREMIN.Public Education[M].New York: Basic Books,1976.

[4]URIE BRONFENBRENNER.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Cambridge [M].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5]吴鼎福.教育生态学刍议[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3):33-36.

[6]吴林富.教育生态管理[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7]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2022-01-10)[2025-03-20].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cxsh/200412/t20041201_78909.html.

[8]教育部等九部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EB/OL].(2016-06-28)[2025-03-20].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cxsh/201607/t20160725_272872.html.

[9]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EB/OL].(2019-02-23)[2025-03-20].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

[10]俞文忠.探讨基于乡村振兴的社区教育发展问题[J].就业与保障,2023(8):67-69.

Dilemma Analysis and Solution Path of Community Education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Feng Panj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Jiangsu Open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6,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theory of education emphasizes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 element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of homeostasi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ecology through the self-adaptive adjustment mechanism. Currently,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ecology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endogenous conflicts, exogenous constraints, spatial imbalance and alienation of participants' roles.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study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from three dimensions: policy reconstruction, cognitive cultivation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At the policy level,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build a government-led, multifaceted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to break down barriers in the existing governance pattern. At the cognitive level, cultivate the ecological cognition and community identity of the residents and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education. At the resource level, relying on digital platforms, a resource-sharing mechanism is built to promote the fair allocatio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effective measures, we can activate the participation power of multiple subjects, bridge the structural gap in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promote th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al ecosystem, thus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society.

Key words: Community education;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Dilemma deconstruc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solution path